

张玉龙 著



蒋廷黻
社会政治思想研究

JIANGTINGFU SHEHUI ZHENGZHI
SIXIANG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092.6

张玉龙 著



蒋廷黻
社会政治思想研究

JIANGTINGFU SHEHUI ZHENGZHI
SIXIANG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研究/张玉龙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004-6727-4

I. 蒋… II. 张… III. 蒋廷黻(1895~1965)—政治思想—研究 IV. 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6666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303千字

定 价 2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张宪文

《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是张玉龙在其博士论文《民族主义与现代化：20世纪30—40年代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今年有幸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值得祝贺的。

我的弟子张玉龙2000年9月考入南京大学，随我从事民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选定以“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这是一个具重要学术价值，同时又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蒋廷黻是民国史上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他起家于学术，兼跨行政、外交诸多领域，其文治事功均显现出殊于时俗、特立独行的特色。

诚如作者自己所言，研究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与自由知识分子，蒋廷黻乃一不可避免之人物，当时主要的思想论争都会涉及他。其政治主张与同时代诸多人物有着许多既是又不是的相似之处。如在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他提出用“科学”与“机械”促进整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思想主张，被后人誉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功臣之一；在经济建设方

面，他提出农工并重的建设方案；在寻求国家统一的途径上，他曾主张“新式独裁”；在讨论对日“战”与“和”问题上，他极力主张低调抗日，建设为先；在对外交涉方面，他力倡外交多元化，反对当局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等。民国时期的学者从政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可以如此认为，这批学者政治家堪称军人集团之外活跃在民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这一特殊群体中，蒋廷黻堪称其典型代表。在长达30年的宦海生涯中，他先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台湾当局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及驻美大使等要职。在同时期学者从政的“博士帮”成员中，他堪称为最成功也是经历最丰富的一位。被时人称誉为“外交斗士”、“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民国以来学者从政最有成就的一位”作为由学术而论政而从政的学者官僚之典型，蒋廷黻同时还是一位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从文化学意义上言之，他属于介于两个世界间的“边际人”。从思想史层面考察，他属西化最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身上洋溢着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鲜明共性，推崇多元化的政治体制，斥于国内的党争、政争，视国家与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从国共关系角度观察，在20世纪30—40年代波谲云诡的政治纷争中，他始终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与这个政权共进退。在随后的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他又成为共产主义的极力反对者，并且在后来联合国中极力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然而，他却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且经常批评当局政治腐败与政略失当，甚至于1949年后又试图组建“中国自由党”，以图刷新台湾国民党政治。在以后“联美”、“赖美”保台之际，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一中一台。不仅如此，他还

与当时许多著名人物，如蒋介石、汪精卫、陈布雷、孔祥熙、胡适、丁文江、吴景超、翁文灏、张嘉璈、吴鼎昌、罗家伦、顾维钧、何廉、王世杰、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魏道明、张伯苓、张季鸾、费正清和前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秘书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等，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其人际关系之复杂于此可略见一斑。可以说，研究一个蒋廷黻能略窥大半部中国近代史。

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及美国的部分学者即开始了对蒋廷黻其人其学的介绍与初步研究，并产生了不少颇具价值的成果。相对而言，中国大陆学界对蒋廷黻的研究起步较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蒋廷黻一直是学界的忌讳。20世纪80年代以降，学术研究氛围相对宽松，以学术研究为旨归的倾向渐趋明朗，蒋廷黻研究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少成果也相继问世。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相关的研究状况与蒋廷黻在民国史上所处的地位殊难相称。海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反映蒋廷黻从政前之思想与史观，而对其以后的思想演变、政治实践及二者间的互动关注较少，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实属必要。

学术研究是一项继往开来的工程。在此基础上，张玉龙对蒋廷黻的社会政治思想与行为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考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该书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第一，蒋廷黻的思想和世界观反映了对这一时期缺乏研究的重要思想风貌。因而，张著所作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该领域的研究缺陷，深化了对蒋廷黻思想的研究。蒋廷黻是一位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又置身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其思想和行为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在20世纪20年代至

40年代提出了许多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在《独立评论》《新经济》和《世纪评论》时期所阐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张，基本上反映出他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作者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抓住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这一主题，对过去因种种原因形成定论的观点进行了客观的解读。我赞同作者这样的认识：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蒋廷黻与胡适之争实乃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双方均未逸出自由主义的轨道，同时，新式独裁主张与当时国内盛行的法西斯主义主张之间亦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同样，其“低调”抗日主张的背后实包含有决心、有条件之抵抗；其40年代后期向自由主义的回归，既是战后特殊国际国内情势使然，亦是其固有理念的自然流露。一言以蔽之，理性民族主义无疑是蒋廷黻思想认知发生如是演变之深层缘由。作者的上述认识，无疑有助于厘清学界在此问题上存在的认识误区，进而还原蒋廷黻这一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第二，关于蒋廷黻思想的研究，前人成果较多，但大多集中于其从政前的思想与史观，特别是其史学思想层面。本书作者则将主要研究时段截取在20世纪30—40年代这一特定的历史空间，用多学科综合研究和长时段观察的方法，从学者从政（政治精英主义）这一独特角度切入，将蒋廷黻的社会政治思想与行为实践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体现出了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对创新的追求。本书第二章侧重梳理了蒋廷黻早期思想的特性，为全文展开的引子，第三、四、五、六章则重点从内政与外交的层面探讨了蒋廷黻的思想演变及其具体的表现形式，第七章以自由主义为题，追述了蒋廷黻思想演变的过程及表现特征。上述几个部分实为有机的统一体，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

第三，张著征引资料丰富，考订详实，且注释规范，一丝不苟。能否尽可能地多占有第一手资料是衡量一部史学论著优

劣与否的重要指标。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作者寻找史料的足迹遍于南京、北京、上海、天津、长沙与邵阳等城市，并通过种种途径获取了散布在中国台湾、美国的珍贵资料。由于有比较详实的资料作为基础，并辅之以细致的考订、分析，作者方可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得出某些客观平实的结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张著中凡征引前人的观点、史料，均一一注明，充分尊重他人的劳动，即便是未刊稿，亦复如此，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神。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学术研究的艰辛与喜悦只有作者自己体会最深。对一个青年学人而言，一个研究课题的完成只能证明艰辛的劳动所换来的阶段性回报，后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课题需要去攻克。我希望作者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取得更大的进步，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和学术界同仁给予批评指教。

谨以此为序。

2007年12月于南京大学

序 二

冯祖贻

蒋廷黻在民国历史上是出名的多面手，他首先是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外交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他那本薄薄的《近代中国史纲》迄今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学人的关注；他做过教授，一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有人称他为教育家；他又是20世纪20—30年代著名的政论家，在《独立评论》上“民主与专制”的论战中，他主张的“新式独裁”说，曾引起轩然大波，因此受到蒋介石注意，这为他以后“从政”奠定了基础；九一八事变后，他又转向“低调抗日论”，终而在1935年正式从政，先后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联合国善后救济署中国代表、中国善后救济署署长及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等要职，成为那一时期以书生身份从政历时最长的名人，并因此获得了政治家、外交家的美誉。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殊少有人关注，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从思想流派角度论，蒋氏思想无疑应归为流行于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之列，但无论从思想的代表性而言或自由知识分子从政经历和声名而论，他都比不过胡适。在近代思想流派研究尚不深

人的情况下，人们大多会将注意点集中于个别拔尖人物及其思想上，这就是直到今天有关蒋廷黻的研究还有不少仍是由胡（适）而涉蒋（廷黻）的原因所在。其二，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在自由主义知识分之中，蒋廷黻的主张是最受蒋介石欣赏的，他主“专制说”，低调对日及其一贯的反共立场更为人垢病，大陆解放后，有限的几篇关于蒋廷黻的文章均冠之以“洋奴”、“买办”的称号，政治的考量代替一切，大有不屑于提及之慨。其三，资料的分散与缺乏。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才出了一套蒋廷黻极不完全的“选集”，蒋廷黻回忆录中文译本迟至70年代才面世，由此才引起台湾及海外学人注意。相对而言，大陆改革开放后研究才步入正轨。值得提及的是，陈旭麓先生在1986年9月1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的《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和次年为岳麓书社就重印蒋著《中国近代史大纲》所写的前言，开了重新审视蒋廷黻思想的先河，此后，研究文章屡屡出现。尽管对蒋廷黻的总体评价，特别是其政治主张的评价仍有分歧，但客观地从时代背景、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质和影响角度进行分析已成主流，研究范围也不仅仅涉及蒋氏的史学著作，且已扩及其外交思想、从政原因、30年代民主与专制论争等诸多方面，反映了大陆学界对蒋廷黻的研究正朝着日益深入的方向发展。

正在蒋廷黻的研究方兴未艾之时，张玉龙同志的《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研究》一书出版了。这部书是他在南京大学师从张宪文教授攻读博士生时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它不只是张玉龙本人数年学习研读的成果，也凝聚了张宪文教授及诸多指导老师的心血。

初读之下，我认为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将蒋廷黻的思想置于民国时期的社会政治变动之

中。民国时期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本书将蒋氏社会政治思想置于其中，既凸显蒋氏思想的一贯性，也兼顾了其间的变化。

如作者的分析，蒋廷黻思想是有变化的，九一八事变前是较典型的自由主义；在《现代评论》与《独立评论》期间，他转向主张新式独裁，希望大军阀吞并小军阀实现中国统一；抗战胜利后，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他又高喊“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要以英、美新自由主义为榜样，用民主政治来求得经济社会的进步，似乎又“回归”到了原先坚持的自由主义。揭示蒋廷黻思想的变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自近代以来，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在力图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即是如如何挽救这个老大贫穷、备受外国欺凌的中国不致沦丧。其代表人物因从国外学来的思想不同，其救国方案也就有了种种差异。自由主义开出的方子就是以西方（主要是美国）为榜样，通过科学（蒋廷黻认为还要加上机械）普及和民主完政，改善人民素质，走渐进式改良道路，让中国从中古走向近代。蒋廷黻对此是始终坚持的。然而他为何在20—30年代又主张新式专制呢？这自然离不开那个时代。众所周知，在大小军阀混战不已，中国人民颠沛流离，命不保夕的情况下，何论建设？外患的日益严重，谁战起来抵御外侮？自由主义者向来瞧不起民众的，胡适是这样，蒋廷黻更是如此；自由主义又与共产主义水火不容，这就是自由主义者蒋廷黻走上“广义的武力统一论”的背景。至于1945年后，蒋氏又举起了自由主义大旗，也应该离不开抗战胜利这个大背景，那时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停止内战重新建设中国，美国又因借助抗战在华势力而影响扩大，“崇美”之风流行一时，蒋廷黻这时高举罗斯福的“新自由主义”大旗，真是适逢其会。这

一过程的揭示，至少告诉我们，为什么自由主义在旧中国知识分子群中会产生一定影响，它不是毫无根据的；建国之初毛泽东大张旗鼓地批美国“白皮书”，也就有了合理的回答。蒋廷黻在自由主义者中颇有特色，它的确是联系“中国实际”的，就以中国作为自由主义的大实验室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他比杜威弟子胡适更接近杜威。

第二，本书不仅以蒋廷黻这个“个案”剖析了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 20 世纪 20—40 年代的流传、影响，而且还将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变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力求在源流上厘清其间的关联。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无不受到西方思潮影响，这便是通常讲的思潮的“源”及“流”的关系。中国吸收西方思潮速度很快，国外有什么“源”，中国就有什么“流”。自然，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其“流”会呈现与“源”的差异。弄清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别，向来是研究思想史一项重要任务，本书对此作了比较清楚的分析。

通常说，自由主义传入中国有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主要接受的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英、法、德诸多经验哲学家、启蒙思想家都是他们的导师。第二时期是以胡适为代表（包括蒋廷黻），主要接受的是英国边沁、穆勒及美国杜威的功利自由主义，但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吸收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形成了英国工党和美国罗斯福式的新自由主义。第三时期是 60 年代后台湾形成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其重要思想则来自哈耶克。三个时期的自由主义，其“源”无不来自西方。

蒋廷黻应是第二时期的代表人物。他颇具特色的自由主义来自哪里？作者抓住这一点，做了认真的爬梳、整理。作者认

为蒋氏最初接受的西方思想资源，不仅有自由主义，同时还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蒋氏自称，他虽信奉自由主义，但却不抱“盲目乐观态度”，这显然有别于胡适。作者分析，蒋氏的态度，也反映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困境，作为勤工俭学生，他长期居留美国，又去过法国，接近下层，对欧美在自由主义旗帜下，民主的种种弊端，比一般人要清楚得多，以至回国后，他常笑胡适对“自由议会”等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为“天真”。

回国后，蒋廷黻的思想经过一番“调适”而主张了“新式独裁”，从自由到独裁，这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几乎是对立，但他仍认为并没有背弃自由主义宗旨，认为当时中国只有统一才能言建设，统一之路只有用武力。在这里蒋廷黻将功利自由主义可谓发挥到极致。分析至此，作者提出了一段很有概括力的话：“作为工具的自由主义与作为价值的自由主义之间以及强调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与强调个体价值和尊严的自由主义间存在天然的紧张，且这种紧张又成为他心中冲突的一个根源。一方面他认为个体自由是一种独立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国家优先于个体的原则。”蒋氏回国后，经过观察与思考，“国家优先于个体的原则，也就自然成为他做出价值判断的首要前提”。作者在这里不仅道出了蒋廷黻思想的困境，也是所有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困境，在西方自由主义那里，自由主义是一种信仰，工具与价值是不会分离的；而中国不同，要实现自由主义改造中国的梦想，只能暂时放弃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所在。蒋廷黻由自由走向保守的根源确在于此。

蒋廷黻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再次转型，与国内形势有关，作者指出这与这时期英、美自由主义的转向更有直接的关系。

将蒋氏的思想置于国际大环境——主要是自由主义的国际大环境之中，既察其“源”，又观其“流”，蒋廷黻富于个人特色的自由主义就脱颖而出；由个别而一般，由蒋氏自由主义的困惑而概及中国自由主义的困惑，这是本书最令人思索与回味的地方。

第三，中国 20 世纪 30—40 年代，政坛上出现过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留学英美的自由知识分子纷纷弃学从政，当上国民政府高官，代表人物除蒋廷黻外，还有胡适、翁文灏等人。解释这一现象，绝非扣上几项如“投入蒋介石怀抱”、“背离自由主义信仰”的大帽子所能解决问题的。在“从政”自由知识分子中，蒋廷黻时间最长，从 1935 年底到他逝世前的 1965 年，整整 30 年，更具代表性。

正如作者分析，自由主义进入 20 世纪，以杜威为代表的功利自由主义便盛极一时，这派自由主义认为，要实现民主政治，个人应对公共事务与社会福利有更大的关心与参与。当胡适、蒋廷黻等接受这一思想，便自然与中国士大夫一向主张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结合起来了。这一思想背景的揭示，便可知蒋、胡、翁等人走上从政道路绝非偶然。加上他们从政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之时，国难当头，中国已命悬一线。至于他们为什么偏偏选中蒋介石国民政府？对蒋介石政权，他们并非不了解，这一批人，以胡适为代表，对国民政府的贪腐、专制、黑暗的抨击，有时也是声色俱厉的，但是他们别无其他选择。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他们始终对苏俄式共产革命有反感。蒋廷黻亲自去过苏联，对苏联建国后工农业经济发展有所认识，这反倒强化了他的新式独裁主张。但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道路不符合苏俄共产主义革命正规，而大加挹伐。既然不能选择中国共产党，那只有寄望于国

民党。蒋廷黻甚至声言：“中央有错，我们应该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国为它是中央！”对蒋介石政权一往情深。因之有人说这是蒋介石的“收买”，是蒋、胡、翁等人的自我“出卖”，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谓的出路上考量，确可能存在这一因素，但绝非主因。

对这一段从政经历，在这批人内心深处留下了什么？殷海光后来作了一段很精彩分析。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观念人物（像胡适、蒋廷黻一流），另一种是行动人物（像蒋介石），在大变革中，行动人物往往会借重观念人物，但“等到新的统治结构出现以后”，“权力化的一元化问题成为转变的枢纽”，“观念人物之中，比较能放弃理想而自认为目的已达的人又变为辅治阶层，比较坚持原有理想而又天真的人慢慢滋生出一种被诱拐（being betrayed）的感觉。当别有机会时，这类的人可能投奔别的公司行号。第一流而又独立思考的人，不是别立门户，就是遗世独立”（《中国文化的展望》）。胡适、蒋廷黻等人的政治命运不是这样吗？他们一度成为蒋介石搞假民主的点缀，成为“辅治阶层”，后来也曾产生“被诱拐的感觉”，他们也想另立门户，这就是40年代末筹组中国自由党的策划，蒋廷黻曾是重要人物之一，但却胎死腹中。

本书分析蒋、胡等入世从政，是从自由主义入手的，可说抓住了问题本质。特别是对蒋廷黻与顾维钧、胡适等在美活动成立中国自由党史事的钩沉（蒋及周围的人是很回避此事的），为这批从政自由知识分子勾画出“辅治——被诱拐——别立门户”这一心路历程，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这只能在中国国情的分析中寻找答案。先看西方，西方自由主义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生、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因此自由主义的根基是资产阶级，即

通常我们说的中产者，自由主义便成为这一阶级判断一切的价值标准，一种信仰。中国不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迟缓，资产阶级弱小，所以自由主义在中国所能依托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极为薄弱，也不可能将自由主义作为判断一切的价值标准。正如作者所分析，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引入自由主义，看重的是它可以成为改造中国的思想工具，所以前述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便会产生矛盾。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待这一矛盾，往往宁要工具而舍弃价值。这样，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使自由主义始终只能在少数知识分子圈子中打转；价值合理性的舍弃，又使人们产生迷茫，使人们对自由主义敬而远之，甚至弃如敝履——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参与国民政府之后。

中国自由主义传播的年代又是中国近代以来各种矛盾极为尖锐化的时期，自由主义实现，最讲究理性与秩序，民国这个大环境无法提供实现自由主义的条件。正如本书所引J. 格里德所说：“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该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与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问题提供什么答案。”（《胡适与中国文艺的复兴》）中国人民并不总是迷信革命与暴力，但当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大山，为中国开出一条新路时，人民只能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路。因此，在国民党政权退出大陆后，自由主义这个理性的乌托邦也在大陆宣告破产。

对于历史家而言，研究历史人物及其思想是不能以成败作最终判断标准的。自由主义及其思想家如胡适、蒋廷黻一代

人，他们的思想与主张毕竟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记，为我们累积了那个时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思想资料；而自由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台湾仍在发展，关注他们的先辈们走过的路是了解世界和台湾地区自由主义的一把钥匙。因此研究历史上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仍有它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我认识张玉龙同志是在90年代，他那时在贵州师大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我因与硕士点主持人吴雁南教授合作多年，便被聘任这个点的指导教师。恰逢我与吴先生在合作编写《清末社会思潮》后，又与几位先生合作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驾轻就熟，我便为张玉龙那一届硕士生开了这门课。在写作和授课时，我已注意到蒋廷黻，深感有研究必要，但如上述原因，在已成书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并未专门论及蒋廷黻，这一直是件憾事。2003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召开“近代中国留学生”学术研讨会，我本想以蒋的研究为题，并电告李喜所教授，李极为赞成，因蒋氏1922年归国，第一个职务便是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但也未能如愿。所以，当知道张玉龙同志在南京大学做的博士论文便是蒋廷黻，便极为高兴。年初接到书稿，匆匆读过，获益甚多。玉龙同志要求我写点什么，但确因对蒋缺乏研究，迟迟不敢动笔，然终究盛意难违，只好写一点“体会”式的东西，以此就教于张玉龙同志及海内外方家。

2008年3月于贵阳甲秀楼寓所灯下